



荐书

来看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年度20大好书”

罗遇真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年度20大好书”评选名单揭晓。评选了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等二十部在2021年颇具影响力和口碑的好书。本期将向读者介绍和推荐这些好书,并挑选其中几本的精彩书评集中编发,让读者大致了解书中内容,领略作品魅力,如果你喜欢,可以随时到书店或网上购买。

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

《文艺报》主编梁鸿鹰说:“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由淮扬名厨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中年人生起笔,展开了个体与血脉、时代、历史相互联结的大叙事。”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指出,“如果我们只是把《一把刀,千个字》看成王安忆得心应手、技艺纯熟的又一部力作,就有可能忽视这部长篇所要挑战的巨大困难。”对于一位成就斐然的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对自己的挑战。王安忆写作四十多年来,她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从不同的层面给予我们更新更深刻的感受。而这部诞生于2020年的新作,“得心应手”地战胜了张新颖所说的各种困难,完成了作者赋予它的使命,“也向虚浮嘈杂的现实提示文学铭刻的庄重和深沉”。

在王安忆的十五部长篇小说中,《一把刀,千个字》的意义和价值,或许不在《长恨歌》之下。这需要读者和时间来验证,让我们阅读、等待。

(摘自“新浪读书”)

梁晓声《我和我的命》

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是女孩儿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

在小说中,梁晓声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刻的关怀。他写道,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和自己相依为命,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

这是一部极具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延安采访的见闻与记录,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

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

(摘自“中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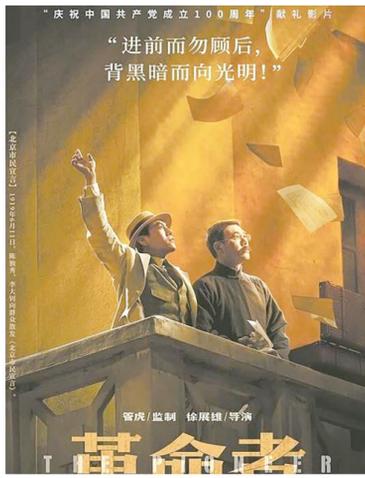
东西《回响》

《回响》是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和《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不同的是,《回响》用了侦探小说的壳,一开头就写了一起命案,一个叫夏冰清的年轻女性被杀,抛尸于河中,右手掌还被切断,嫌疑人徐山川、徐海清、吴文超、刘青、易春阳次第浮现。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是冉咚咚,她的先生是西江大学的文学教授慕达夫。东西在关于《回响》的创作谈中说,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涌,相互缠绕形成‘回响’。这么一写下来,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爱与恨”(《现实与回声》)。但整部小说,比案件推理更内在的一个维度是情感心理分析。案件侦破部分写出了在欲望沉浮中的人性溃败,而对冉咚咚、慕达夫这对夫妻及其周围人群的深度心理分析,则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人的情感困境和内心挣扎——生活在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同时,自我也越来越让人觉得陌生且不可思议。认识自己,远比认识别人、认识生活更艰难……《回响》不仅是东西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也是这两年我读到的中国小说中最生动、绵密、厚实,也最具写作抱负的一部。

——(摘自有顺评论东西《回响》:《日常生活令人惊悚的一面》)

其他十几本好书

- 范稳《太阳转身》
- 郭流《靠山》
- 郭英德、李志远《明清戏曲序跋集(全12册)》
- 李红真《萧红大传》
- 伊莎贝尔·阿连德作品集
- 尼古拉·瓦·提安哥文集
- 王小鹰《纪念碑》
- 李兰妮《野地星光》
- 王笛《那间街角的茶铺》
- 李宇《群山呼啸》
- 余亮《小先生》
- 李修文《诗来见我》
- 葛亮《瓦猫》
- 康震《康震古诗词81课》
- 止庵《受命》



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浪漫史诗——浅析《革命者》立意与叙事之关系

李星雨

纵观百年红色电影史,即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真实写照。我国红色电影紧跟时代浪潮,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多如群星璀璨。但仅从宏大叙事中“主旋律”和“高大全”的表达形式来看,确有审美疲劳之感。恰逢建党百年之际,由管虎监制,徐展雄执导的《革命者》与国人见面,影片以李大钊先生慷慨就义的前三十八小时作为叙事主线,采用倒叙手段加之交叉回忆叙事等非线性叙事手段,力图在短时间内展现真实立体的革命者形象。可以说,在英雄榜样系列之于红色电影中,要在宏大立意与叙事创新之间做充分平衡的条件下,影片《革命者》诚然是一部具有创新探索性的红色佳作。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叙事为立意服务。所谓革命叙事,即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革命事件与英雄人物,达到革命精神传承的目的。按革命叙事类型分类,影片《革命者》是介于成长类和史诗类之间的“新类型”。

首先,它打破了成长类革命叙事中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叙事逻辑,转而将叙事主线安排在李大钊先生牺牲之前,开场漆黑压抑的布景与倒计时提示无不暗示着主人公即将遭受不公的待遇,其间交叉进入回忆叙事以反映时代背景,让观众“由果寻因”的过程使影片在拍摄历史人物时又增添了生机和神秘色彩。其次,它对于史诗风格做了试探性的创新,影片通过一个共产党人的视角使整个民族特定时期的跌宕起伏得以展现,影片通过独白、演讲、授课等一系列闪回的回忆将李大钊先生的形象进行立体化塑造,其具有一定的“个人史诗性”。片中的李大钊先生穿梭在农场、报社、图书馆、早餐店。为报童的死不平、为浴池的乞丐演奏手风琴、为工会同事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陈独秀争执和和好……无不体现他的憨厚与可爱,如此更凸显他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影片也在叙事与立意中达到和谐统一。

如今,一些重大题材的影视剧不再满足于构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而是注重历史与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敬仰英雄,怀念先烈,又不甘让百年前的炬火只存在于扁平化的文字记忆中。李大钊先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践行者之一。书本里的画面已刻在国人脑海中,想在尊重历史内容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并非易事。而影片巧妙地采用“浪漫叙事”,一位共产党员,当他面临反叛者的屠刀时,他会真诚地说出:我李大钊也怕。导演试图在这一刻褪去李先生的光环,诚然,人在死亡面前总会有忌惮,可心中那份炽热而崇高的理想早已为自己做出了判断,牺牲之身,挽回国之觉醒,难道这不浪漫吗?难道折翼的翅膀其羽毛不耀眼吗?这个时代急需重新思考浪漫的定义,多数人仅仅将浪漫局限在了儿女情长等男女之事上,拘泥于明星八卦上,致使国人的审美能力久久不能提高。而在国家的“披荆斩棘”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探索中,诸位如李先生这类的人物已通过荧幕走入观众视野,更多正能量的角色来日可期,这既可以丰满观众的内心,对于“浪漫”之类的词汇也有了更加宽泛的理解和认知,我国文化市场得以稳步迈进。

一部影片如何真正打动人心?其主题的选取自不必说,更在于如何在宏大立意中娓娓道来,是否让观众感到距离感以及能否让观众相信。影片《革命者》作为建党百年之际推出的红色电影,在技术手段和叙事方式上都有可喜的进步与突破。但于今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从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浪漫史诗开始。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信仰超乎于生死的概念,也让我坚信那些奔走于市,形色各异的人中总会有那么一两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你全力挥动着红旗自远方而来,身上布满了新世纪的气息。我手捧那篇《庶民的胜利》,听你在台上振臂高呼:布尔什维克,伟大的共产主义万岁!我也化为一束光,声音在心中响起:我相信!我坚信!

意味深长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

黎福清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段令人深思的插曲:老态龙钟的乾隆皇帝终究太老了,人老眼花,有时看不清东西,难免糊涂起来。一次,他在大臣朝拜的朝会上,指着一盏宫灯说:“我感到这盏宫灯歪了。”众大臣明知宫灯挂得端端正正,但皇帝老子讲歪了,该如何是好?宫廷一片寂静。这时,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的和坤凑上前附庸着说:“皇上,这宫灯是歪了。”乾隆说:“那你把它拔正吧!”和坤拿着挂钩,左拨右拨胡弄了一阵,正挂着的宫灯反被搞歪了。

一段小插曲,滑稽而可笑。但笑过之后,闭目深思,感到事情虽小,意味深长。

在人们的心目中,皇上的话是金口玉言,但是否就是句句正确?事实作了回答,不一定。说皇上金口玉言,句句真理,这是人为的结果,是统治者的需要。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知错认错、闻过则改的英明君主,汉武帝就是其中的一位。

乾隆皇帝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但他到了晚年,不免糊涂,轻听小人之言,致使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在乾隆执政期间,有一位叫孙嘉澍的大臣,曾奏上“三习一弊”疏,他把历代皇帝常犯的毛病归纳为“三习”:即耳习、期心习。耳习,即习惯于下属的媚语,习惯于大臣的顺从。期心习,即习惯于下属的媚语,习惯于大臣的顺从。皇帝常被小人包围,听不到真正的声音,国事不免日非,势必低及统治。三习之弊发生在掌权者身上,是一种腐败的政治现象。孙嘉澍的奏议,给乾隆敲响了警钟,可惜乾隆年事已高,身不由己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即使是圣贤,也难免有过失和错误,重要的是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灯不歪,皇帝说歪了,面对上面的错误,作为下属该怎么办?这里有三种态度。一种装糊涂,不说话,不表态,以糊涂对糊涂。这种态度,倒也省去许多麻烦,且能保住乌纱,该有多好?难怪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出现,就行情看好,官人争相购买,大有洛阳纸贵之势。第二种态度是,看着上面的脸色办事,上面说黑的,他也说黑的,上面说白的,他也跟着喊是白的,似乎脑袋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像和坤之流那样。有时偶尔把主子的意图领会错了,他就扇自己的耳光:“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吹吹拍拍,见风使舵,阴谋诡计,祸国殃民!这样的人往往又能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要这样的人去捉弄官灯,倒是把一统江山搞歪了。第三种态度是,敢说真话,办实事。像剧中的刘墉那样。刘墉有个外号,叫“刘三本”,每次上朝,别人装聋作哑不作声,他却拿出三本奏折,如实反映民情,关心百姓疾苦,有时也揭露一些腐败。有些人不高兴,于是要算计他,陷害他,于是他的官位一降再降,从一品降到八品,最后摘了乌纱,打进大牢,险些掉了脑袋。

刘墉是个驴子,北方人叫罗锅,外形不美,但他敢说真话,办实事。是位优秀品德,受到老百姓的热烈赞颂。正如该剧主题歌唱的那样:“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你就是那量定的星。”刘墉在人民的秤盘里,自然显出了他的重量!

夜市书摊

杨志

夜市街七弯八拐,狭窄漫长。我东进西出,没发现如意之物,两手空空慢腾腾地哼着小曲悠然踱步。突然眼前一亮,出口处靠近公园边的凉亭旁摆着一块地书摊,绿色的化纤布上东倒西歪地堆满了旧书。守摊的是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贼亮的路灯暴露了他疲惫的脸色。书摊清冷,只有一个白了头的胖大爷戴着老花眼镜,捧着一本老书,坐在交叉的小板凳上津津有味地阅读,样子有些滑稽。

生性爱书的我连忙在书摊前蹲了下来。书不多,约三四十本。一边是学生们的教科书,一边便是“大杂烩”,文学、哲学、美学等好多书都有。书有新有旧,有几本新书还用薄纸包着没开封,旧书居多,有些书还残页卷角。价格也有老有新价,厚的一本老书只要几角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新价是近些年出版的却要几十元一本。我拿了一本精装的《动物庄园》问摊主多少钱,摊主忙说是外国名著,没多少人爱看,你喜欢,半价给你。我说十块钱行吗?他说行,你拿去。我高兴,又买了一本《亨利短篇小小说选》。

头晚捡漏了,第二天高兴再来,见书摊看似生意不咋地,却也卖了不少,今天又增添了好多旧书,都是中外名著。我家的书橱里没有这些书,而且几乎全是老版本。我边翻看边问瘦高的年轻摊主旧书从哪里来,他告诉我说是从废纸回收站挑出来的,也有他父亲的藏书。我一下买了五六本,买了本几十年畅销全球的《飘》,我只花了十元钱。

从此,我没事就来书摊,淘了好多喜爱的书,也和瘦高年轻人交成了朋友。我知道他叫小春,老家是北方人,他父亲是下放知青,二十年前他跟父亲来到这个城市打工,不几年便按揭买了新房,谁知前几年父亲患了重病,家里经济拮据,父亲叫他把他家收藏的旧书报书画作品卖了。虽没卖多少钱,但他爱上了这生意。

有一次,我在书摊看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只有第一、二、四卷,差了第三卷,我买了,但心里总觉残缺。小春说你喜欢的,我一定帮你找到第三卷。谁知夜市突然被撤销,所有摊主都走了,小春的书摊也不见了,贼亮的路灯照着冰冷的凉亭。

临近年下,这个城市飘起了罕见的雪花。我穿着棉大衣,袖着双手,踏着碎步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曾经的书摊。书摊早几天前就不见踪影,只见寂寞的凉亭和寒冷的飘雪。忽然,有个戴着风雪帽的北方人,开着三轮车碾薄雪来到我身边。是小春!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平凡的世界》第三卷微笑着递给我,并告诉我他在这里等了几个晚上。他很尊重喜爱读书人,答应的事决不失约。我双手接过路遥的名著,心里蓦然涌动一股暖流,我觉得这个腊月的寒冬比春天还温暖美好。